

# “她们”以何治村?

吴森<sup>1</sup>,张津<sup>1</sup>,张聪丛<sup>2</sup>



(1.华中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2.郑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 妇女治村已成为当下中国农村的一个显著现象,乡村社会治理环境变迁为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创造了有利的制度与社会空间。以女支书这一治理主体为例,从“嵌入方式—参与动机”两个维度将妇女治村划分为四种类型,在Y县的四个典型案例中得以验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治理结构与治理资源两个影响村庄治理场域的因素出发,分析四类妇女治村的策略取向,分别为创新发展、产业发展、现状维持以及真诚服务。推进农村妇女实质性参与村庄治理是实现男女平等参与和优化乡村治理的重要路径,国家应对不同年龄段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采取分类激励、加强村委会班子建设、加强女性村干部的能力建设等举措,从而激发农村妇女在村庄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嵌入方式; 参与动机; 妇女治村; 女支书; 治村实践

**中图分类号:**D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5)06-0159-13

**DOI编码:**10.13300/j.cnki.hnwxb.2025.06.015

政治性别平等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sup>[1]</sup>。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大量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呈现出“女性化”<sup>[2]</sup>的特征。在“男工女耕”的性别分工模式下,社会流动加速了父权制的衰落<sup>[3]</sup>,将农村妇女从家庭推向了公共领域<sup>[4]</sup>。同时,农村社会老龄化与空心化、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及法治化建设推进的叠加效应,使农村事务治理逐渐趋于规范化、流程化,政治化程度较低的农村妇女也能应对。2021年,全国49.1万个村两委班子换届,女性成员比例达到28.1%,比上一届提高7.1%<sup>[5]</sup>。农村妇女超越自身或家庭利益局限进入公共领域,在推动村庄发展、维护村庄秩序等工作上发挥重要作用,其耐心、细心的“柔性特质”也符合当前农村社会的治理需要<sup>[6]</sup>。当下,妇女治村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妇女治村即由农村妇女执掌村庄治权,引领村庄治理的现象。本文重点关注具有村庄治理领导权和决策权的女性村支书(以下简称“女支书”)及其治村实践。

回顾现有文献对妇女治村问题的探讨,研究重点主要聚焦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讨论公共领域“女性无形化”现象。弗里德曼认为年龄与性别的差异导致女性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从属地位<sup>[7]</sup>,男性通常被定位于公共领域,女性则被定位于私人领域<sup>[8]</sup>。男性对公共组织的长期控制形成了以男性观点为主的组织标志<sup>[9]</sup>。在此情况下,女性要么接受男性的组织标志,要么接受在行政组织中的边缘化位置<sup>[10]</sup>。所以,拥有男性化特质的个体被认为更适合担任领导职务<sup>[11]</sup>,女性的情感、关心、同情等特质既被行政组织排斥<sup>[12]</sup>,也与领导角色不符<sup>[13]</sup>,通常被限定在那些被认为符合女性特质的小范围职位上<sup>[14]</sup>。同时,农村家庭劳动分工延续“经济支柱/家庭主妇”的性别分工模式<sup>[15]</sup>,农村妇女承担了较多的家务劳动<sup>[16]</sup>,从而具有较强的内敛性,在公共治理领域常被忽略<sup>[17]</sup>。此外,传统社会性别意识也排斥农村妇女进入公共领域<sup>[18]</sup>。二是讨论妇女治村面临的问题。随着村级组织行政化越来越明显<sup>[19]</sup>,乡村治理趋于规范化,对村干部职业化和行政化的要求也就越高<sup>[20]</sup>,很多西部农村的男性村民难以满

收稿日期:2025-09-3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组织—治理’整合视角下的社区治理模式、治理绩效以及影响因素研究”(7247407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公共政策执行的整合逻辑与运行机制研究”(23BZZ002)。

足这一要求,因而一些时间多、学历高的农村妇女得以进入村委会中。当前,农村妇女开始从制度性参与转向实质性参与<sup>[21]</sup>,可以凭借自身的能力和优势成为治理精英<sup>[22]</sup>。然而,农村妇女并非传统村治精英,缺少传统村治精英所具备的人情、关系、权威等治理资源,具有“去精英化”的特点<sup>[23]</sup>。同时,大多数女性村干部缺乏治村经验,但随着乡村治理事务的转型与治理目标的明确,只要按照政策要求执行即可,其行为具有明显的任务导向<sup>[24]</sup>和行政化<sup>[25]</sup>的特点。这些特征使女性村干部在权威来源、治理行为和治理资源上独特于男性村干部<sup>[26]</sup>。

上述研究对影响农村妇女参与的原因进行了丰富讨论,对理解妇女治村有一定启发意义,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是主要讨论了妇女参与不足的原因,未讨论越来越多农村妇女担任村支书这一主职的社会事实,也未能关注妇女治村实践的差异。二是以男性经验为标准来解释妇女治村问题,导致女性参与的数据、经验缺失。对妇女治村研究议题的忽略,构成了乡村治理研究的一个盲区。相较于男性村干部的兼业性,女性村干部的专职性更强,与当前农村治理的规范化、制度化相适配,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治理工作中。本文重点关注女性村干部,尤其是女支书的治村实践及差异,而非延续传统对男女两性进行对比,这对挖掘农村妇女治理能力,激发其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性具有现实意义。

综上,本研究的问题是,作为村庄治理的核心领导,女支书群体内部有何差异?这种差异对村庄治理有何影响?最终形成哪些治村类型?对此,本文基于场域视角来分析妇女治村实践及其差异,并归纳了四种典型妇女治村类型及其影响因素。

## 一、视角转换:村庄场域中的妇女治村实践

### 1. 妇女治村的场域环境

随着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乡村治理相关研究开始由“民主选举”转向“有效治理”<sup>[27]</sup>。对此,已有研究大致从两个方面讨论了影响村庄治理的场域环境。

一是讨论农村社会环境及其变化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农业税费时期,村庄秩序依靠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制度性关联维系<sup>[28]</sup>。农业税费取消后,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制度性关联消失,村干部解决村庄内部问题的积极性也消失,村级组织筹集资源维系村庄秩序的能力弱化<sup>[29]</sup>。对此,国家由对乡村社会的资源汲取转变为资源输入,但在项目竞争机制下,有能力的村干部才可能争取到项目资源<sup>[30]</sup>。国家的权力、制度、规则进入村庄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的人情治理模式<sup>[31]</sup>,但不同村庄的资源条件、发展水平以及地方政府意图使村治形态具有多样性。

二是关注村内行动者的互动、村庄结构对村庄治理的影响。村内社会网络对村干部行动的影响已被证实<sup>[32]</sup>。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主要依靠乡绅、能人等内生力量进行治理<sup>[33]</sup>,以宗族为核心的社会关系被视为影响村庄治理的重要因素<sup>[34]</sup>。宗族关系为村干部的沟通、协调、调解提供了便利<sup>[35]</sup>,但也可能控制村干部的行动,将村庄公权变为宗族私权<sup>[36]</sup>。此外,村干部本身的能力与资源也是影响村庄治理效果的重要因素<sup>[37]</sup>,村干部在知识水平、个人能力、治理资源和社会关系上的差异,使其作用发挥效果不同<sup>[38]</sup>。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分析了不同资源形态下村治精英的类型及其治理样态<sup>[39]</sup>。

上述两个研究维度具有互补性,前者从宏观角度探讨农村社会环境如何影响村庄治理实践,后者从微观角度讨论村内积累性资源对村干部的影响。正因如此,以这两大维度为基础的研究可能存在盲区。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内部资源,都是构成村庄治理环境的具体要素,基于不同资源的村干部与村庄场域的结合可能形成多种治村样态。本文从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治理资源出发,对典型的妇女治村案例作整体思考。从理论取向上看,本文旨在对妇女治村进行相对客观的类型学划分,进而讨论其治村差异与影响因素。

### 2. 场域视角下的妇女治村及其实践差异

(1)“嵌入方式—参与动机”的组合式分析框架。传统村治精英以男性为主,相关研究也以男性为主或以男性经验解释妇女治村问题。本文突破这一性别研究局限,关注女支书的治村经验,但仅

从个体视角来分析显然过于单薄，农村妇女担任村支书并引领村庄治理，不仅是个体努力的结果，更是乡村治理转型与性别分工变化的结构性要求所致。因此，场域理论为分析妇女治村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场域是某一社会中各种参与者的总和及他们之间的动态网络，内部存在复杂的社会关系和行动规则<sup>[40]</sup>。村庄场域不仅塑造了女支书所处的治理结构，也蕴藏了她们所需要的治理资源。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场域视角将女支书置于村庄环境中来整体分析。在这一视角下，“嵌入方式”与“参与动机”是切入妇女治村问题分析的前提，直接关系她们在村庄治理结构中的位置与治村时可用的资源。前者指农村妇女嵌入村庄的方式，包括内生和外引两个维度；后者用于衡量农村妇女出任村支书的积极性，包括主动和被动两个指标。

“嵌入方式”是分析农村妇女参与治村的基础条件。有学者基于村干部在村内是否有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将其划分为“内生型”和“嵌入型”<sup>[41]</sup>，“内生型”是以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长期生活在村内的村干部，且在村内拥有丰富的治理资源；而以行政介入或利益诱惑从外引入的嵌入型人才，长期生活在村外且与村内缺乏情感联结，村内治理资源贫乏，形成了向外发展的治村取向，“嵌入型”也即本文所说的“外引型”。在实践中，“嵌入方式”与个人身份、能力、家族力量、与政府的关系、与村民的关系、任职动力等相关。

“参与动机”是理解农村妇女进入村两委，担任村支书的逻辑起点。有学者从参与动机角度将村民参与概括为“动员型”与“主动型”两类<sup>[42]</sup>，前者是在外部力量的影响下，被动参与村庄治理，后者是村民主动参与村庄治理。参与动机体现的是农村妇女参选村支书，参与村庄治理的动力机制，不同参与动机的女支书在治村取向上极大不同。在村庄治理实践中，女支书既有积极的行为表现，也有消极的行为表现。

本文以“嵌入方式”和“参与动机”两个维度为标准，将典型案例划分为四类（表1）。典型案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行制度下妇女治村的发展趋势。但是，典型性不是个案再现总体的依据，而是集中体现某一类现象的重要特征，因而以典型女支书治村案例为研究对象，不仅有方法论支撑，还能对普遍性的妇女治村提供启示。

（2）影响妇女治村实践差异的因素。人口外流导致农村“空心化”、老龄化，传统以宗族、乡绅为核心的治理模式被逐渐解构。同时，国家资源下乡，但人口向城市流动，形成“资源输入”与“人口输出”的张力，且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治理目标由“稳定”转向“有效”。在这一背景下，乡村治理研究也正在从“谁在治理”转向“如何治理”<sup>[43]</sup>，这两者分别对应治理结构与治理资源。在乡村治理中，妇女的嵌入方式、参与动机决定了她们在村庄治理结构中的位置与治理资源掌握情况。其中，嵌入方式决定她们在村庄治理网络中的权力位置，是否拥有村内治理资源；参与动机影响她们的村庄治理面向，是积极拓展外部资源发展村庄，还是利用已有资源维持村内秩序。治理结构与治理资源共同塑造了女支书的差异化治村策略。具体来看：

首先，治理结构决定了女支书在村庄治理中的权力位置。治理结构是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分配模式、来源渠道以及影响力等要素的有机组合<sup>[44]</sup>。从乡村社会实际来看，中青年男性处于需要大量经济资源来维持家庭再生产的人生阶段，而农村就业机会与收入都少，他们只能流向收益更多的城市。这为农村妇女释放了充足的参与空间，提升了她们在村庄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在村庄治理中，治理结构与村民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任职动机等相关，也受个人身份、年龄、学历的影响。

其次，治理资源影响女支书在村庄治理中的行动面向。治理资源是指女支书开展工作时所能借助的工具或力量，传统男性村干部具有父权制赋予的天然社会权威与政治权威，而且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进一步提升了男性在农村社会中的社会权力，这使得男性村干部在村内拥有丰富的治理资源。不同于男性村干部的治理资源，女性村干部缺乏传统社会权威与政治权威，更

表1 类型划分与田野选择

类型	嵌入方式	参与动机	经验对象
I	外引	动员	金龙村ZZR
II	外引	主动	白泥村TLL
III	内生	主动	南庄村ZLJ
IV	内生	动员	石印村CFX

多依靠自身的性别优势、年龄与学历优势、家庭与社会关系的支持。特别地,被引流回村的年轻女支书需要借助个人能力向外拓展治理资源。

最后,治理结构与治理资源共同塑造女支书的治理策略。女支书的治理策略是其根据自身在村庄结构中的位置与所掌握的治理资源,而采取的适应村庄场域的治理手段。女支书选择哪种治村策略体现了农村妇女作为独立的个体,能够适应村庄治理情景,最大化发挥个人治理能力,促进村庄建设与发展的能动作用。

## 二、研究方法与案例介绍

本文以西部农村地区的女支书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相比于东部地区女支书出现的特殊经济社会基础,西部农村女支书的出现与农村人口结构、性别分工以及乡村治理事务的变化紧密相关,更能体现乡村社会变迁对妇女参与的影响。同时,女支书拥有对村庄事务的决策权与领导权,她们的决策领导决定着村庄治理的整体方向,这是非主职女性村干部所不具备的。因此,本文仅关注西部农村的女支书及其治村实践。为了理解女支书及其治村实践样态,采用多案例比较研究方法更为合适,该方法强调对两个及以上的案例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和提取某一类问题或现象的相同性因素<sup>[45]</sup>。

本文案例均来自Y县<sup>①</sup>,该县位于贵州省东北部,曾为国家一类贫困县,自然发展条件差,经济基础薄弱,因此大多数男性村民选择外出务工,女性则留守村庄劳动。在这一背景下,Y县涌现出大批年轻化、知识化的女性村干部,占比近45%,其中,女支书比例近19%<sup>②</sup>,高于《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提出女性村主任比例达到10%以上的目标。Y县女支书的年龄多在20~45岁,大专学历占据大多数,反之,笔者走访其他村发现,该县男支书年龄多在45岁以上,学历也普遍较低于女支书,大专学历的较少。而且,同一县域的村庄社会、自然环境相近,保证了案例之间的可比性。在控制环境变量的基础上,本文遵循差别复制的逻辑,从Y县选择金龙村、白泥村、南庄村和石印村的四位女支书作为考察对象(表2),这些案例恰好处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村治理转型的关键节点,是观察西部妇女治村及其实践类型的典型代表。

表2 案例基本情况

村庄	姓名	年龄	学历	专业	身份特征	工作经历	村庄情况
金龙村	ZZR	25岁	大专	会计	遴聘到村的外来人	2019年到Y县参加“西部计划”,在基层做会计	全村472人,多为留守老人儿童。该村是森林公园的途经村,国道贯穿村庄,由县司法局对口帮扶
白泥村	TLL	24岁	大专	市场营销	成长在外的村民	之前在杭州的一家企业从事酒水采购	全村1613人,原一类贫困村,是国家级湿地公园建设地和县级示范村,由市乡村振兴局对口帮扶
南庄村	ZLJ	41岁	高中	无	本村村民	之前留守儿童,2017年进入村委会做监督委员,一直到换届担任村支书	距离街道办最近,全村846人。该村有市级特色田园乡村示范点、4A级旅游景区、旅游山庄、中国空心李之乡等资源优势,当地政府将南庄空心李作为“一镇一品”特色产业大力发展,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打造了“中国空心李之乡”和南庄旅游名片,维修了长320米的南庄大道/2.5千米的旅游观光路;新修2座公厕、2座文化长廊和1座观光亭;建成8亩观光苗圃花卉基地;开发2.7千米河谷观光路,建成2个露天游泳池;民居改造147户;引导新开张4家农家乐,初步建成“生态型乡村旅游示范村”
石印村	CFX	42岁	中专	医学	外来媳妇	在村内从事20多年村医	全村1035人,自然条件差,原国家三类贫困村,林业局对口帮扶,发展空心李和精品水果

① 遵从学术惯例,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已做匿名处理。

② 数据由作者根据Y县女性村干部数量与全县村干部数量计算得出。

针对每个案例，本文收集了详细的调研资料。2022年8月21—30日，笔者前往Y县实地调研，一对一访谈了四位女支书，也访谈了驻村干部、村委会其他干部、村民，从多元主体视角了解女支书的治村实践情况。同时，笔者还居住在村委会，方便观察女支书的日常工作，保证每位女支书至少2天的观察时间，包括跟随她们参加工作汇报、政府会议、村庄巡逻、入户走访以及院坝会等，获得了丰富的一手资料。此外，笔者还收集了工作记录、工作台账等文本资料作为补充。

### 三、多案例比较：妇女治村实践及其类型

在Y县，农村妇女能够出任村支书，与乡村治理对村干部的能力要求提升、农村性别分工变化密切相关。从Y县妇女治村实践来看，女支书在细心、耐心上明显强于男支书，且与周围男支书相比，女支书更加注重男女村干部的分工合作，但不同女支书在治理方式上有明显差异。

#### 1. 类型Ⅰ：金龙村ZZR

(1)“被遴聘”到村的外来女支书。2021年全国村两委换届对村干部候选人的学历和年龄提出了“一升一降”<sup>①</sup>的要求。在这一条件限制下，金龙村仅一位男性村民符合村支书的任职资格，但以工资<sup>②</sup>过低为由放弃参选，村支书职位陷入无人参选的窘境，老村干部不得已向当地政府申请委派。经街道和县政府研判，决定从“五个一批”<sup>③</sup>村级后备人才库中选择ZZR到金龙村任职。在国家政策的激励下，年轻的村支书只要认真履职，掌握各项农村政策内容，服务期满后就有机会考取基层编制，获得职业晋升。对于到金龙村担任村支书，ZZR也说到：

“第一，我还年轻，想来村里面积累基层工作经验，后面可以考编。第二，可以磨炼自己的意志。第三，和农户打交道虽然很难，但也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20220826-ZZR)<sup>④</sup>

(2)向外拓展资源的创新发展策略。作为“外来人”，ZZR刚开始的工作不被村民接受。一是没有嵌入村庄社会关系中，缺乏必要的家族与熟人支持。二是过于年轻，缺乏农村工作经验。所以，金龙村在其他村干部配备上以年纪较长、权威较高、治村经验丰富的男性村干部为主，他们在处理一些重大矛盾纠纷上更有性别与年龄优势；在包村干部<sup>⑤</sup>的配备上也以年长的为主，分别指导年轻女支书的村务治理与政务执行。如ZZR刚到任时，几乎每天待在村委会，不与村民交流、不了解村庄情况，所以村民不认可她担任村支书。对此，老村干部与包村干部给予她指导：

“之前村民都不服她，我们建议她常去村民家吃饭聊家常，主动了解村民，加强与村民的情感联系，后来村民就把她当自己人了。”(20220827-YXZ)

由于缺乏村内治理资源的支持，ZZR采取向外发展的治村策略。一是向政府争取项目资金<sup>⑥</sup>。金龙村种植了1500亩空心李，但产业路未经修缮，无法满足运输需求。产业路修建离不开资金投入，

- ① 为了解决村干部老龄化、缺乏创新的问题，提升村干部队伍综合素质能力，国家提出村干部任职条件实施“一升一降”，“一升”是指村两委成员的学历提升，具备中专、高中及以上学历，“一降”是指村两委成员平均年龄结构下降，有些地方要求村支书、村主任年龄不超过45岁。
- ② 2021年，Y县发布《提高村干部报酬的通知》，村干部报酬实行“基本报酬+任期补贴+绩效奖金+养老保险”。村支书、主任“一肩挑”最低月报酬4485元，村支书、村主任最低月报酬3541元，村文书、会计、副支书、副主任最低月报酬3450元，村监督委员会主任最低月报酬3141元。
- ③ 为了优化农村干部结构，破解村干部队伍建设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等难题，国家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即研判留任一批、返引回乡一批、机关选派一批、招聘考录一批、本地培育一批，以村为单位，把组织认可、综合能力较高的优秀年轻干部选拔出来，建立1990年后村级后备干部人才信息库，作为村两委换届的推荐人选。
- ④ 访谈记录编码规则：访谈日期+被访者姓名首字母。
- ⑤ 在Y县，原是贫困村的政府帮扶干部称为驻村干部；非贫困村的政府帮扶干部称为包村干部。驻村干部需要长期居住在村内开展工作，包村干部不需要居住在村内开展工作。
- ⑥ 2022年1月，金龙村向县政府申请“金龙村空心李园区产业路硬化路项目”，路长2.1千米，其中毛路开挖及硬化300米，宽4米，C25混凝土厚15厘米，建涵管4道，每千米设车道3个。

农业税费取消后,村级组织向下汲取资源的脉络被切断<sup>[46]</sup>,只能向政府申请项目资金,而能否争取到项目资金与村干部个人能力紧密相关<sup>[47]</sup>。为了获得项目资金,在包村干部的指导下,新支书以在金龙村修路符合政府收益为由——既方便运输空心李售卖,也能发展山上森林公园的旅游,从而使该村项目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政府批示。之后,最难的工作是解决村民土地占用问题。在规划路段中,有300米毛路需要开挖,会占用部分农户的土地,由于涉及农户私人利益,没有人愿意让出土地用作修路。面对这一棘手问题,ZZR 缺乏社会权威,只能跟随老村干部去做村民的思想工作,否则村民不买账。经过2个多月的协调,ZZR 也体会到农村工作的难处:

“农户觉得轻易让地,别人会觉得你好欺负。修这条产业路,上面地是这家的,下面地是另一家的,如果只占一家地或哪家多占一点,村民就会觉得不公平。我们花了很大的时间精力去做村民的工作。”(20220826-ZZR)

二是创新空心李销售方式,帮助村民增加收入。村民之前主要靠人工背运到附近集市售卖,运输量有限,销售渠道单一,收入有限。为了帮助村民拓宽销路,新支书主动采取网络直播带货的方式帮助村民售卖,仅一个月就卖出2万多斤,为村民增收30多万元。

年轻女性担任村支书为金龙村注入了新的治理活力,但因缺乏村内治理资源不得不向外拓展资源,以增强其个人治理权威,不仅增进了村民的福利,获得村民的认可,其本人也被推选为全市、全省优秀青年代表,并被当作重点基层干部培养。对此,该村文书说到:

“以前村民都叫她‘小张’,现在叫她‘小张支书’”。(20220826-XMH)

## 2. 类型Ⅱ:白泥村 TLL

(1)主动回乡发展的青年女性。白泥村党员干部老龄化问题严重,留守的村民没有符合村支书任职条件的人选,驻村第一书记便从在外务工的年轻人中物色,TLL 是其中最适合的人选。从2021年2月开始,第一书记就采取多种策略劝说她回村,一方面以家乡发展需要动之以情;另一方面以国家对年轻人回村的政策激励展示机遇,并承诺给予工作指导,打消其回村顾虑。经过深思熟虑,TLL 于5月主动回村,选举前一直在村委会学习。

“当时第一书记打电话问我不要来做村支书,我还很犹豫,怕自己做不好。但如果真的要做村支书,我虽然年轻,但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要奉献,而且村里各方面条件都提升了,家人也在这,回来发展家乡也不错。”(20220828-TLL)

(2)嵌入政府资源的产业发展策略。作为回流的年轻人与Y县年龄最小的女支书,TLL 在上任之初能力就遭受了村民的质疑,并感受到身份变化带来的工作困难:

“以前觉得那些公公婆婆挺好相处,现在发现真难搞。以前的村干部都是年纪比较大的男性,所以很多村民觉得我一个女娃能干什么。”(20220828-TLL)

由于TLL 缺乏村庄治理工作经验,因而在村干部配备上以年长的村民为主。市乡村振兴局下派了驻村第一书记主持工作开展,街道也下派了两名驻村干部充当“资料员”,帮助她分担行政任务。

对年轻女支书来说,大多数行政任务按政策要求执行就能完成,因为经常入户,对农户底数摸得清,数据录入及时,政府来检查时可以快速调出数据应对。但作为村里的小辈女性,在村内人微言轻,群众工作力不从心,尤其是整治乱办酒席,村民几乎不听,如果向政府通报,就要被村民怨恨,接下来的工作,村民也都不配合。虽然有德高望重的长辈支持,但作用非常有限。然而,年轻也是优势,长期生活在外使她与村内社会“脱嵌”,利益关系牵涉少,做事更加公平公正。与之前以男性村干部为主的治理效果相比,TLL 担任村支书后,有效改善了利益分配不公、干群关系差的问题,提高了村民对村委会的评价。

在村庄发展上,TLL 主要向政府争取资金来发展村内产业。一是规划村内产业发展布局。空心李是Y县的核心产业,但白泥村种植少,且长期散养,缺乏质量保障,卖不出好价钱。为了提升空心

李质量，TLL落实了之前村干部设想的空心李发展规划，向政府申请了200亩空心李提质改造规划，第二年村民通过售卖空心李增加了收入。此外，TLL还借助第一书记的力量向市乡村振兴局申请产业项目资金，发展了200头肉牛和4亩地龙产业，拓展了村内产业的多样性，也吸纳了村内老人就业。

二是重启湿地公园项目建设。白泥村之前被纳入乌江国家湿地公园建设范围，2016年财政资金断裂后，白泥村段被迫停工。但放任项目长期烂尾对村庄整体发展影响很大，也浪费了大片优质农田。村民对这一问题的反应一直很激烈，在村民看来，种粮食比获得占地补偿更重要。对此，在第一书记的指导下，TLL密切关注政府工作动向，及时争取项目资金，于2022年6月重新获得资金投入。

### 3.类型Ⅲ：南庄村ZLJ

(1)主动担任村支书的留守妇女。与其他村不同，南庄村由于资源禀赋优异而留存了较多的治理精英，村支书职位有多个竞争者，主要是原村委会成员，且多是男性，但他们的年龄较长，精力跟不上农村治理需要。因此，综合学历、年龄、工作经验来看，ZLJ是最适合的人选，其良好的家庭经济条件为她全心投入治村工作提供了支持。她本人主动竞选村支书是为了就近就业，获得稳定收入与方便照顾家庭。更重要的是，老支书也支持她担任村支书：

“刚毕业的大学生到村里来，很多都不懂。ZLJ的文凭够，也年轻，又是村里人，做过监督委员，清楚村里面情况。而且女同志在入户、调解矛盾上也有优势，说话委婉。男同志嗓门大，听着不入耳。村里很多工作都是面向群众，很多人以前都是文盲，得跟他们讲道理，这方面女同志比较有耐心。”(20220825-LZS)

(2)基于村内资源的现状维持策略。ZLJ是南庄本村人，在村内有深厚的家族支持，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她的工作开展，如有些亲戚要求她在评比低保时多加“照顾”，否则就会被亲戚指责不向自家人，也会被其他村民认为不公平。对此，ZLJ与其他村干部交换，去对方亲戚家劝解，避免被村民说偏心亲戚。

大多数农村工作是跟群众打交道，且多为村民之间的利益纠纷。2022年夏季当地发生干旱，蓄水池用水紧张，村民为争夺水池使用权而引发冲突。ZLJ不敢直接去现场劝架，而是请社会权威更高的老支书一同出面解决。

“做群众工作，先要顺着他们，让他们吵完闹过后再去做工作。但村干部一定要公平，一旦农户觉得你偏心，后面工作都会被一票否决。群众工作要考虑的问题很多，思想要做通才行。有时候我们去给农户讲道理，有些农户就是不听，还去政府告我们。我们该做的都做了，问心无愧了。”(20220825-ZLJ)

南庄一直是当地政府重点发展的示范村，在政府的主导下，该村完成了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完善的村庄治理体系。因此，ZLJ在治村策略上以维持村内现有发展为主，继续利用产业品牌和村庄区位优势来推进农旅融合，发展村集体经济，增加村民收入。但作为示范村，该村行政负担非常重，ZLJ作为村支书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迎接政府检查。

“上面安排的任务，给的时间很充足。但我们村迎检多，今天这个领导来，过几天那个领导来，哪个级别的都有，领导一来就要花时间接待。”(20220825-ZLJ)

作为典型的留守妇女，ZLJ担任村支书后，也面临工作家庭难以平衡的困境。因此，村委班子的合理搭配对这类女支书的工作开展非常重要。南庄村干部的年龄均在40岁以上，难以适应信息化办公，村委会不得已向街道申请两名年轻人到村负责数据录入和资料撰写。在包村干部配备上也是S街道主要领导来指导南庄的行政与迎检工作。

“村里的事情太多太重，所有部门的任务都压在村里，动不动就要追责，我们的工作压力也大。当村支书后，也忽略了儿女的学习。”(20220826-ZLJ)

此外,ZLJ也是从非主职到主职村干部的典型代表,与之前做监督主任时只能参与零碎的工作不同,担任村支书后,她在村委会中的话语权明显提升,有权决定村庄治理的许多事务。

#### 4. 类型Ⅳ:石印村CFX

(1)被动出任村支书的女村医。石印村常住人口不到400人,且多为留守老人儿童。在村两委换届之际,村支书无人竞选。出于对村集体利益考虑,老支书不想让外人来掌控村庄治权,因此动员村医CFX参加村支书选举。CFX长期入户行医的经历使其与村民之间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她担任村支书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支持。

“村民都知道我的为人,而且哪一家什么情况,村里什么情况我都清楚。做村支书和做村医的感受不一样,我也希望能在做村支书的过程中学到新东西,提升自己”。(20220827-CFX)

(2)基于村民信任的真诚服务策略。CFX作为外来的媳妇,以婚姻关系为基础的家庭资源是其在村内立足的关键,其特殊身份也代表了嫁入妇女的利益。这一特点使CFX的治理资源主要来源于家庭、嫁入妇女的支持,因而在村内矛盾调解上,她主要找嫁入妇女一方,更能产生情感共鸣,便于工作开展。

石印村村干部的整体年龄较大,驻村干部配备则以年轻人为主,可以充当资料员,负责信息编辑与录入,资料撰写及表格数据报送等工作。县政府还安排了一位乡村振兴指挥长指导乡村振兴工作。为了村委会内部的有效分工合作,CFX制定了村干部工作分工的细则。对此,驻村第一书记说到:

“支书对村内事务很有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也会找我们商量。她还根据村委会每个人的特点做了一个分工表,我们都跟着支书干。”(20220827-ZL)

CFX接任村支书后,首先是规划修缮村内基础设施。村里有两条路和三条沟渠未修缮,在下雨天,山上泥土会冲刷下来淹没村路,不仅影响村内环境卫生,也影响村庄发展,而之前的村干部未重视这一问题。但由于个人能力有限、与政府联系较弱,且村庄无特别发展优势,目前没能争取到政府资金投入。所以,治村策略以服务村民为主,并承袭做村医期间的“服务”理念,将自己定位于“服务者”角色。

相比其他村的村支书,CFX经常组织村干部走访留守老人,并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搬运重物。同时,还注重对村内环境的治理。石印村公共区域常年无人打扫,导致过路人对村庄环境的印象特别差。对此,CFX向村民宣传环境卫生治理的重要性,发动村内老党员、志愿者、公益岗位、留守老人、妇女参与环境治理,并根据党员数量划分14个责任片区,由党员干部带头,定人定岗定区域开展卫生整治。

“我们村每个月至少开展一次环境卫生整治,现在村里卫生干净,房前屋后堆放有序。然后再安装路边栏杆,做个文化长廊,展示我们村的文化面貌。”(20220827-CFX)

CFX虽然是被老支书动员担任村支书的,但自上任就备受村民们信任,积极真诚为村民服务,被村民视为“满意的支书”,符合当下农村社会老龄化、空心化的治理需要。CFX自己也说到:

“我目前没给村里带来过资源项目,所以就为大家服务好。政府的项目资金也在争取,明年继续申请。”(20220827-CFX)

### 四、妇女治村实践差异的影响因素

上述四位女支书面临的政策环境一致,村庄的社会自然环境也近似,但治村实践却大相径庭。结合案例,本文归纳了塑造妇女治村实践差异的主要因素(表3)。

结合表3和前面表1来看,类型Ⅰ、Ⅱ都是在行政介入下,以职业晋升为突破口吸引青年女性到村担任村支书。比较来看,类型Ⅰ为外村人,与村民之间无亲缘、地缘联系,因而缺乏村内资源支持,

表3 四种妇女治村实践类型

类型	年龄	学历	治理结构			治理资源	治理策略
			与村民关系	与政府关系	任职动力		
I	相对较低	相对较高	疏远	较弱	职业发展	拓展外部资源,自身能力	创新发展:利用自身能力从外为村庄谋利益
II	相对较低	相对较高	疏远	较强	发展家乡,职业发展	争取政府资金,家族支持	产业发展:积极拓展政府资源发展村内产业
III	相对较高	相对较低	熟人	较强	获得收入,照顾家庭	村庄基础条件,村民与家族支持	现状维持:完成行政任务,维系村庄治理现状
IV	相对较高	相对较低	熟人	较弱	学习新知识	村民与家庭支持	真诚服务:无力争取政府资源,服务村民

治村策略以引入政府项目、发挥自身优势来创新村庄发展。类型Ⅱ是生于村内、长于村外,主动回乡发展的年轻人,在村内有血缘、亲缘关系,与政府的联系也较强,治村策略以拓展政府资源来发展村内产业为主。类型Ⅲ、Ⅳ是村庄内生长的女支书,长期生活在村内,与村内社会联系紧密。但比较来看,类型Ⅲ是为了获得收入与照顾家庭,这类女支书不仅有着较强的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也因村庄资源禀赋而与政府保持紧密联系,村内基础设施与治理体系完善,在治村策略上以维系村内发展现状为主。类型Ⅳ是被动员担任村支书,个人也希望在做村支书过程中实现成长,在村内的治理资源以婚姻关系构造的网络关系为主,与政府的联系较弱,治村策略以完成村内任务、服务村民为主。

### 1. 治理结构决定妇女在村庄治理中的权力位置

妇女能占据村庄治理核心位置得益于男性劳动力外流所让出的权力位置。妇女治村并非独立于村庄场域外的个体行动,而是深嵌于村庄治理结构。在农村女性化背景下,嵌入方式与参与动机及其所衍生出来的与村民关系、政府关系、任职动力等是塑造女支书在村庄治理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关键。作为农村社会中特殊的领导群体,女支书在村庄治理结构上与男支书不同,她们的嵌入方式更加多元化,不同的嵌入方式决定了她们在村庄治理中的权力位置差异,进而塑造差异化的治理面向。具体来看:

第一,在外引低龄女支书中,如类型Ⅰ和Ⅱ,她们的治理权威主要来源于个人能力而非村民认可、信任或支持。在内生长女支书中,如类型Ⅲ和Ⅳ,她们的治理权威主要来源于村民的支持、熟人关系与情感联结。第二,类型Ⅰ和Ⅱ嵌入村庄的程度低,与村民联系弱,村内治理资源较少,因而采取向外拓展治理资源的策略。类型Ⅲ和Ⅳ嵌入村庄的程度较高,与村民联系强,村内治理资源丰富,因而主要采取向内维护村庄治理秩序的策略。第三,政社关系对女支书的行动影响很大,就类型Ⅰ、Ⅱ中的低龄女支书而言,可以发挥个人能力争取到政府项目资源,为村庄带来实际的利益,以此增强她们在村内的治理权威。而类型Ⅲ、Ⅳ中的年长女支书,由于个人能力相对较弱,除非是村庄自身条件禀赋能吸引到政府的注意力(类型Ⅲ),否则难以争取到政府的项目资金(类型Ⅳ)。第四,类型Ⅰ和Ⅱ是通过国家的职业晋升政策激励,来提升年轻女支书的工作积极性,类型Ⅲ和Ⅳ由于长期留守村庄,且年龄较大,职位晋升无望,所以这一类女支书则以经济激励为主,促使她们在村庄治理中持续发挥作用。

### 2. 治理资源影响妇女治村的行动面向

男性自古就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治理精英,在村内拥有深厚的社会关系,如果个人能力强,对他们村治工作是锦上添花。而对比发现,女性村干部的治理资源深受传统父权制文化、个人身份的影响,在村内治理资源上弱于男性村干部。以治理资源为基础分析妇女治村,可以发现:对嵌入度低的外引低龄女支书来说,其治理资源更多来自个人能力,如创新能力、社交能力、学习能力等,能够为村庄从外部带来利益。同时,她们公平公正办事特点也是获得村民认可的重要基础,如类型Ⅰ和Ⅱ。对嵌入度高的年长女支书来说,其治理资源多来自村民信任与家族支持,这些村内资源是她们开展工作的关键,如类型Ⅲ和Ⅳ。女支书所掌握的资源类型会影响她们在村庄中的行动范围。

治理资源的影响作用发挥依赖于特定的村庄场域与个体能力。村庄场域是指在国家行政权力与农村自治权力下,女支书与其他治理主体互动、治理资源运用的村庄场景。个人能力指女支书应对村庄各类治理问题的综合能力,取决于个人所能调动的,与治理任务相匹配的各类资源,包括个人能力、家族家庭支持、村内社会关系网络。从案例实践来看,治理能力是调动治理资源的基础,女支书所能获取的村内外资源存在结构性不平衡,从而导致她们在村庄治理中的行动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被压缩。具体而言,在低嵌入度的年轻女支书中,如类型Ⅰ和Ⅱ,村民利益协调、纠纷调解、移风易俗等群众工作超出她们的能力范围,但却在争取政府项目、发展村内产业等工作上表现凸显;而高嵌入度的年长女支书,如类型Ⅲ和Ⅳ,资料撰写、表格数据填报等文书工作普遍超出她们的能力范围,但却适应老龄化、女性化的村庄治理需求。

### 3. 妇女治村的差异化行动策略

治理策略与治理结构、治理资源之间存在关联,反映了乡村社会结构性变迁在村干部行为上的映射。从本文案例来看,嵌入度低的年轻女支书主要依靠个人能力、驻村干部的指导以及外部资源的持续引入,来打破村内治理资源缺乏对其行动的限制,但其治村策略也因是否为本村人而产生差异,形成类型Ⅰ和Ⅱ两种分野。从嵌入度高的年长女支书来看,尽管丰富的村内治理资源为其工作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但由于个人外向发展和拓展资源的能力较弱,因而有维持治理现状(类型Ⅲ)或重点服务村民(类型Ⅳ)两种分化。

治理策略也表现为女支书在治村实践形态与行为选择上的差异。从村庄内部而言,治理策略受女支书在村内的治理结构与治理资源的影响,农村妇女成为引领村庄治理的村支书后,其嵌入方式与参与动机决定了她们在村庄治理结构中的位置与治理资源掌握状况。尽管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对中国农村社会产生了较大冲击,但传统人情社会关系依然影响着村干部的工作开展<sup>[48]</sup>。年轻女支书在村内缺乏村民的信任、社会关系的支持,可能会丧失对村内治理的实际话语权,不得不向外拓展治理资源,以弥补自身村内权威不足的短板,如类型Ⅰ、Ⅱ;而年长女支书有着相对丰厚的村内治理资源支持,会持续强化对村内资源的利用,而非拓展外部资源,如类型Ⅲ、Ⅳ。

总体来看,女支书的嵌入方式与参与动机,及其所构造的治理结构、治理资源是塑造她们治村实践差异的主要因素。但归根结底,这些要素是性别分工在村庄治理中的延续。当前乡村治理中的性别分工是历史传统、经济结构与制度安排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乡村社会中,以土地为核心的农业生产模式和父权文化影响塑造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男性因重体力劳动主导农业生产与村庄政治,女性则因生育、育儿及家务劳动被锚定在家庭再生产领域,在经济上需要依附男性,在乡村社会中缺乏话语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男性取得了土地权益的支配性地位,女性因婚育流动而面临土地权益受损的困难。这些社会制度强化了男性村民在乡村社会的权力,女性进一步被限制在家庭领域。

近年来,由于乡村产业结构单一、就业机会有限、经济收入较低,同时伴随农村育儿观念变化和家庭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大量男性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以赚取更高的收入,为家庭再生产提供经济支撑;农村妇女则留守乡村劳动与照顾家庭。这种家计模式促使乡村治理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农村男性劳动力的外流不仅改变了农村人口结构,也使得农村妇女的角色发生了显著转变,乡村“男少女多”的人口结构向农村妇女释放了更多村干部职位,农村妇女不再仅承担传统的家务劳动与抚育后代的职责,而是逐渐走向村庄治理的前台,有机会出任村支书、主任等主要职务,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管理与决策,成为乡村治理中不可替代的“她力量”。

同时,随着农村治理事务逐渐向规范化转型,文书工作、乡村建设等“软性”工作增加,农村社会留守老人、儿童、妇女居多,女性村干部的细致耐心优势也符合当前这些工作的需求,而男性村干部仍主要在纠纷调解、森林防火等体力工作上发挥作用,这种村务分工也是农村性别分工的延续。而且,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建设的步伐加快,也对村干部提出了年轻化、知识化的要求,以适应逐渐专业化、复杂化的村庄治理需求。在中青年男性外流情况下,传统以年长男性担任村干部的

村治模式，普遍缺乏创新活力，难以适应当前乡村建设与发展的需要。而广大农村妇女无论是年龄上还是学历上，相较年长男性村干部更适合，能为村庄治理注入新动能。妇女出任村干部不仅有助于打破传统农村社会由男性掌握资源分配的权力结构，缓解农村妇女因婚育流动、土地权益被剥夺等带来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也为妇女提供了稳定的工作机会与收入，使“女耕”的劳动与社会价值进一步显化。中国农村村干部年轻化、女性化的趋势，在不断推进农村男女政治平等的同时，也促使乡村治理逐渐迈向规范化。

## 五、结论与启示

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使得村治主体出现了年轻化、女性化的趋势，尤其是在西部农村，越来越多农村妇女担任主职村干部，成为引领村庄治理的话事人。然而，理论滞后于实践，已有研究主要从两性比较的视角讨论影响妇女参与不足的因素，忽视了越来越多农村妇女已经成为主职村干部的事实，也忽视了她们的治村实践差异。本文选择具有村庄治理决策权和领导权的女支书作为研究对象，以嵌入方式和参与动机两个维度，将妇女治村划分为四种类型，并从治理结构、治理资源两方面讨论了妇女治村的实践差异。

作为一项经验性研究，本文贡献在于归纳了当前农村社会中存在的妇女治村现象，展现了现有制度环境下妇女治村的发展趋势，为促进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村庄治理提供了参考经验。一方面，政府引流回村的年轻人、农村社会中留存的大量农村妇女是村庄治理的重要力量，补位了农村社会流失的传统治理精英，也可以发挥农村妇女的治村作用。另一方面，从妇女治村实践来看，既要遵从国家的制度要求与目标设置，又要遵从村内自有的运行结构。但中国农村社会是高度分化而非抽象的整体，不同的村庄场域会影响妇女治村的实践方式。本文分析在立足于妇女治村的实际经验基础上，先呈现个体化的治理逻辑差异，再上升到普遍性的妇女治村问题。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农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推动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不仅是事关男女平等参与的政治议题，也是事关乡村治理的社会议题。当前，中国农村女性村干部的比例虽然提高，但相对于农村妇女总人口而言依然不高。国家在提高妇女参与村庄决策管理时，不只追求表面数量的增加，更要推动农村妇女的实质性参与。根据上述结论，关于有效推动农村妇女参与，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以情感利益为牵引，结合经济激励和职业激励，强化村干部职位对农村妇女的吸引力。对不同年龄段的农村妇女采取差异化的措施，对青年妇女侧重于职业激励，对中年妇女侧重于经济激励。(2)加强村委会班子建设，搭建男女性别合理、年轻与年长平衡的治理平台，与女性村干部形成合理分工。(3)加强女性村干部能力建设。由于农村妇女普遍缺乏村庄公共参与经验，政府要结合农村社会治理需要和女性村干部的特点，加大对女性村干部在行政工作、群众工作、项目管理、农业经营等工作上的业务培训，提升农村妇女的履职能力。

## 参 考 文 献

- [1] LOMBARDO E, MEIER P. Challenging boundaries to expand frontiers in gender and policy studies [J]. Policy & politics, 2022, 50 (1):99-115.
- [2] PAN L, WU H. Moving to the fore: young women farmers in China [J]. Young and femal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future of farming, 2025: 71-92.
- [3] 曹晋,曹浩帆.流动民工的男女平权与代际父权制再生产——基于大都市医院“双薪护工”劳动与微信沟通实践的分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1,58(3):82-94,159-160.
- [4] 金一虹.嵌入村庄政治的性别——农村社会转型中妇女公共参与个案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19(4):10-27.
- [5] 江娜.全国村“两委”换届完成,妇女在村班子中占28.1%提高7.1个百分点[N].中国妇女报,2022-05-23(01).
- [6] 王印红,李莉.女性何以增进社区治理效能?——基于Q市三个社区的案例研究[J].公共行政评论,2021,14(6):66-84,198.
- [7] 弗里德曼.女性主义[M].雷艳红,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 [8] SUN S, CHEN F. Reprivatized womanhood: changes in mainstream media's framing of urban women's issues in China, 1995—

- 2012[J].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2015,77(5):1091-1107.
- [9] ACKER J.Inequality regimes: gender, class, and race in organizations[J].Gender & society,2006,20(4):441-464.
- [10] 卡米拉·斯蒂福斯.公共行政中的性别形象——合法性与行政国家[M].熊美娟,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 [11] BAUER N M, SANTIA M. Going feminine: identifying how and when female candidates emphasize feminine and masculine traits on the campaign trail[J].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2022, 75(3): 691-705.
- [12] THELMA C C, NGULUBE L. Women in leadership: examining barriers to women's advancement in leadership positions[J]. Asian journal of advanced research and reports, 2024, 18(6): 273-290.
- [13] TREMMEL M, WAHL I. Gender stereotypes in leadership: analyzing the content and evaluation of stereotypes about typical, male, and female leaders[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3, 14: 1034258.
- [14] LAWSON M A, MARTIN A E, HUDA I, et al. Hiring women into senior leadership positions is associated with a reduction in gender stereotypes in organizational language[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22, 119(9): e2026443119.
- [15] WANG S, CHENG C. Opportunity or exploitation? A longitudinal dyadic analysis of flexible working arrangements and gender household labor inequality[J]. Social forces, 2024, 102(4): 1446-1466.
- [16] ANDREW A, CATTAN S, COSTA DIAS M, et al. The gendered division of paid and domestic work under lockdown[J]. Fiscal studies, 2022, 43(4): 325-340.
- [17] 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看不见的女性[M].詹涓,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22.
- [18] 卿石松.中国性别收入差距的社会文化根源——基于性别角色观念的经验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9,34(1):106-131,244.
- [19] 仇叶.行政公共性:理解村级治理行政化的一个新视角[J].探索,2020(5):153-167.
- [20] 王向阳.政治引领:中西部留守型村村干部职业化的动力机制探析——基于陕西扶风X村村干部职业化实践的考察[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5(3):16-24.
- [21] 郭夏娟,魏芫.从制度性参与到实质性参与:新中国农村女性的治理参与及其地位变迁[J].浙江社会科学,2019(9):15-25,36,155-156.
- [22] 海莉娟.从经济精英到治理精英: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路径[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5):48-56.
- [23] 杜姣.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主体的去精英化与村干部职业化[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2):38-47.
- [24] 林辉煌,刘鑫月.村干部职业化的发生机制及其影响——基于村干部主位视角[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46(1):21-27.
- [25] 杜姣.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治主体精英结构的转型及其影响[J].探索,2022(3):154-165.
- [26] 袁明宝.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实践研究——以川西平原农村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23(6):70-77,23.
- [27] 王春光.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民主”与“有效”治理的匹配问题[J].社会学评论,2020,8(6):34-45.
- [28] 贺雪峰.村级治理现代化与治理有效[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76(6):197-204.
- [29] 贺雪峰,桂华.资源下乡背景下的基层治理重塑与改进[J].政治学研究,2025(3):92-105,238.
- [30] 姜国俊.资源下乡背景下乡村关系的差序格局及其形塑逻辑[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0(1):136-146.
- [31] 李祖佩.项目下乡与农村基层治理模式优化——以“嵌入的自主性”为视角[J].政治学研究,2023(6):202-213,236.
- [32] 允春喜,王飒.乡村振兴中精英俘获现象的生成逻辑及其破解——基于鄂东C村的个案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7(2):66-76.
- [33] 刘开君.从士绅到新乡贤:乡村精英治理的传承与流变——基于晚清以来浙江上虞乡村治理的案例分析[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3,12(4):20-31.
- [34] 王海霞,董慧娜.宗族权威、社会动员与乡村治理的有效性[J].东南学术,2023(3):165-173.
- [35] 韩燕,何欢,张琴,等.宗族组织、权威人物和农民进城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以川南乡村筹资修建“户户通”公路为例[J].公共管理学报,2021,18(2):105-114,172.
- [36] MATTINGLY D C. Elite capture: how decentralization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weaken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J]. World politics, 2016, 68(3): 383-412.
- [37] 崔盼盼.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能人治村[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1):131-140.
- [38] 罗博文,吕悦,余劲.村干部角色与乡村治理有效性——基于秦甘滇三村的案例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4):17-26.
- [39] 李祖佩,梁琦.资源形态、精英类型与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2):13-25.
- [40] DIMAGGIO P J, POWELL W W.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 48(2): 147-160.
- [41] 李华胤.治理型中坚农民:乡村治理有效的内生性主体及作用机制——基于赣南F村的调查[J].理论与改革,2021(4):116-128.
- [42] 谢炜,郝宇青.村规民约实施中村民参与的逻辑嬗变——基于A市F村的实证案例[J].社会主义研究,2024(3):99-107.
- [43] 狄金华,钟涨宝.从主体到规则的转向——中国传统农村的基层治理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4,29(5):73-97,242.
- [44] 何晓龙.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结构转换与机制创新——以资源约束型村庄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24(6):146-163.

- [45] 风笑天.个案的力量:论个案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及其应用[J].社会科学,2022(5):140-149.
- [46] 黄杰,吴文旭.权力的资源网络:当代国家能力与乡村治理绩效——基于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H村的考察[J].求实,2025(1):91-108,112.
- [47] 李京蓉,申云.项目进村与乡村公共品供给不平衡——基于村干部能动性的视角[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7(2):62-71.
- [48] 郑家豪,周骥腾.农村人情治理中的行政嵌入与规则融合——以重庆市川鄂村整顿“整酒风”事件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20(5):40-51.

## How Do “They” Govern the Village?

WU Miao, ZHANG Jin, ZHANG Congcong

**Abstract** Women's governance of villages has become a prominent phenomenon in rural China. The changes of the rural governance environment have created favorable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space for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village governance. Taking female village party secretaries as the main actors, this paper categorizes women's village governance into four distinct types based on two dimensions: mode of embeddedness and motivation for participation. These four types are validated through four typical cases in Y County. Furthermore, the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strategic orientations of the four typ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governance resources, which influence the field of village governance. The four strategies are identified a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atus maintenance, and sincere service. Promoting the substantive participation of rural women in village governance is a crucial pathway toward achieving gender equality in participation and optimizing rural governance. The government should adopt differentiated incentive mechanisms for women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strengthen village committee leadership teams, and enhance the capacity building of female village cadres, so as to stimulate women's positive role in village governance.

**Key words** mode of embeddedness; motivation for participation; women's village governance; female branch secretary; rural governance practices

(责任编辑:余婷婷)